

吴敬琏 主 编

比 较

28

Comparative Studies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白重恩 谢长泰 钱颖一

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保罗·克鲁格曼

企业自主创新的几个政策性问题
陈清泰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太少
迪利普·慕克吉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
普拉纳布·巴丹

新实证发展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考希克·巴苏

新发展经济学及其理论挑战
阿比吉特·班纳吉

理想状态的发展经济学
拉维·坎布尔

从大城市中心制到城乡平衡发展
速水 佑次郎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F0-53
19
:28
2007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28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28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86-0817-4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6191号

比较·第二十八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0817-4/F·110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卷首语

过去一年，自第22辑到第27辑的六册《比较》有相当篇幅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所面临的现实，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不平衡、收入差距、发展模式、政府治理等问题，《比较》都针对现实与问题向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文章。“要想深入了解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一位学者如是说，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如此去努力做。“中国过度投资”几乎是人人都在谈的定论，因此，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的《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文可能有那么一点“爆炸性”的味道。作者首先提出过度投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的发问？他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自然的指标就是应该测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该论文译自《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2006年第二期上的英文稿。论文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用同一方法测算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剔除城镇居民住宅部门和在资本存量中加入商业存货后，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近几年甚至有上升的趋势。总之，本文对包括所有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形式的总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并没有找到中国投资率过高的证据。而对资本回报率部门差异的初步分析还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编委钱颖一曾经指出，经济学现在把潜在决定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层次因素概括为三类：地理、开放和制度。本辑的“前沿”栏目就是从地理因素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在《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分析了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集聚的两种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利用这一“两力分析”框架对世界经济版图的分布、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大城市产生的偶然性等现象给出了简单而有力的解释。作者特别强调，由于现实问题的极端复杂，在理论的

政策应用方面需要特别谨慎，尤其要提防被利益集团所利用。

“改革论坛”栏目的《企业自主创新的几个政策性问题》是企业家、官员和学者融于一身的陈清泰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题目。他认为，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培育国际领先企业必须有核心技术。但是，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致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谁也不愿意“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因此，“认真解决阻碍企业创新的体制和政策有本质意义”。

近期，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顾问们经常提到居民储蓄存款的反常增长和由此形成的高储蓄率是影响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于中国居民储蓄的真实现状，例如储蓄的动机、储蓄的结构、储蓄在各个收入阶层之间的分布，似乎都没有清晰、翔实、有说服力的说明。李超的《中国城乡居民的货币需求：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种解释》从结构视角，利用大量现成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货币需求行为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描述，对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给出了一种解释。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所有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都很高，不同特征的居民群体在储蓄行为及结果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储蓄存款的数量和结构十分复杂。因此，未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转变思路，采取综合的、更加灵活的措施，以求实现货币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在“发展经济学专题”一栏中，我们为读者提供了五篇印度经济学家的论文，他们在这五篇文章中，讨论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引起多次争论的方法论问题：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波士顿大学迪利普·慕克吉教授的论题是《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中是否太少？》。他认为，近十年来，实证和政策问题日益成为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理论研究有受到忽视的嫌疑。作者从理论的发展的四个阶段：实证描述、理论的构建、验证和估计、预测和政策评估出发，回顾了发展经济学在过去70多年的主要成果，指出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不同时期各自发挥的作用。最后，针对忽视理论探讨的倾向，作者列举了很多仍然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强调解决经济关系的结构是社会科学与之俱来的目的。

伯克利加州大学普拉纳布·巴丹教授则回顾了近二十年来发展经济学

取得的进展，他认为新近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虽然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也有可能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分关注精确的量化分析，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偏离了对经济现象原因的研究。巴丹用一个经济学家经常遭到的批评来描述当前实证研究的极端化倾向——“经济学家不是在黑暗的地方，而是在更多亮光的地方寻找丢失的钥匙”。

康奈尔大学考希克·巴苏教授则对新实证发展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评论。巴苏教授从知识怀疑论和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直觉和实证结果、实证预测和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说：“问题不是在理论和实证之间做出选择。相反，我们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都要尽可能正确，然后根据我们的直觉做出选择，并把选择出来的结果作为我们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胸有成竹”。

擅长实证分析的麻省理工学院阿比吉特·班纳吉教授似乎更多的是对实证分析的肯定。他认为，确实需要弥补过分注重实证研究带来的损失，但是，“我也深信，不假思索地拒绝实证研究带来的危害绝不亚于发表那些错误结论带来的危害”，“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领域，缺的不是观点，而是辨别力，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来筛选坏观点、识别好观点，并使好观点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巴苏教授的同事拉维·坎贝尔教授则在《理想状态的发展经济学》中对上述四位教授的评论做了总结。他指出，理论和实证的争论双方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没有人认为利用简单的相关性做因果推断是实证发展经济学特有的做法。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可以完全控制数据赖以产生的环境，使“正确的”推理成为可能，也需要理论帮助我们做出权衡取舍。理论研究应该充分利用15年来实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继续研究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样，理论和实证研究才能齐头并进，实现理想状态的发展经济学。”

速水佑次郎的《从大城市中心制到城乡平衡发展模式》讨论的是发展经济体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应该考虑哪种模式更有利。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东亚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日益向大城市集中，同时工业生产急速扩张，导致了严重的城市拥堵和污染，并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他以日本的经验述说了，全球化过程中存在城乡平衡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是各国间商品和服务更加自由的流动，并不一定必

然造成城乡不平等的恶果。然而，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条件之一是大力发展连接农村生产者和国际市场的国内贸易网络，文章特别强调了应当建立起什么样的贸易网络，以及发展这一网络的方法和手段。

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难题可能就是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处置。在本辑的“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北大法学院副教授郭雳对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和债务重组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详细和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在考虑为不良资产处置立法时，到底是针对资产管理公司立法还是针对不良资产这一行为本身立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CIDEG专栏”中，我们选用了CIDEG文库将出版的《绿色城市》一书中的第五章“收入增长和绿色城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一直都是生态环保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否能同时兼顾两者也是他们争论的核心。由于绿色治理具有很强的公共品特性，作者侧重从空气质量、水质量、固体废弃物以及城市土地管理等绿色治理的供给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将更可能兼顾。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八辑

- 1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白重恩 谢长泰 钱颖一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

by Chong-En BAI, Chang-Tai HSIEH and Yingyi QIAN

前沿

Guide

- 23 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保罗·克鲁格曼

The Role of Geography in Development

by Paul Krugman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41 企业自主创新的几个政策性问题 陈清泰

Some Policy Issues on Self-innovation in Firms

by Chen Qingtai

- 56 中国城乡居民的货币需求：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种解释 李超

The Demand for Money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 Research on

High Saving Ratio of Residents in China

by Li Chao

发展经济学专题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 77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太少 迪利普·慕克吉
Is There Too Little Theory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by Dilip Mookherjee
- 87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 普拉纳布·巴丹
Theory or Empiric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by Pranab Bardhan*
- 94 新实证发展经济学：对其哲学基础的评论 考希克·巴苏
The New Empir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marks on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by Kaushik Basu*
- 103 新发展经济学及其理论挑战 阿比吉特·班纳吉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Challenge to Theory
by Abhijit Banerjee
- 113 理想状态的发展经济学：不过分理论、不过分实证，但要小心熊
拉维·坎布尔
Goldilocks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t Too Theoretical, Not Too
Empirical, But Watch Out for the Bears *by Ravi Kanbur*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s

- 119 从大城市中心制到城乡平衡发展 速水 佑次郎
From the Megalopolis-centered System to the Rural-Urban Balanced Growth
by Yujiro Hayami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31 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法律困境及其改善

郭雳

Legal Distress and Progress on the Bank NPL Resolution

by Guo Li

CIDEG专栏

CIDEG Column

- 143 收入增长和绿色治理

马修·卡恩

Income Growth and Greener Governance

by Matthew E. Kahn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白重恩 谢长泰 钱颖一

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超过40%，从全世界范围看，这个投资率已属于最高水平。面对如此高的投资率，我们自然会问，中国的投资是否已经过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资本-劳动率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投资的潜在回报理应很高。另一方面，正如卢卡斯曾指出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技术落后，制度环境恶劣等其他一些约束条件，可能会限制发展中国家潜在的资本回报率（Lucas，1990），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可能存在。我们经常看到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事实，表明穷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不总是比富国高。

中国存在过度投资的含义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自然的指标是资本回报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即使投资率很高可能也不会引起资本回报率的降低。换言之，中国的高投资率，恰恰可能是因为它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于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否有显著的降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否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要考察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投资配置：中国在某些行业或地区是

* 本文由作者发表于美国《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6年第二期上的英文稿翻译而成。作者感谢钱震杰在我们的研究中所提供的出色的研究助理工作以及对本文的翻译，也要感谢Olivier Blanchard, Richard Cooper以及其他参与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讨论会（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会议的学者对本文的讨论。我们还要感谢国家统计局的许宪春先生与我们就统计数据所进行的讨论。——作者注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长泰，伯克利加州大学副教授；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编者注

否存在过度投资，而在另一些行业和地区又存在投资不足呢？中国各行业和省际之间的资本回报率是否有很大的差别呢？这些差别随时间改变的趋势又是如何？

本文测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具体而言，我们用资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按市场价值计算的资本产出比、折旧率，以及产出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增长率来计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这一方法，尽管在概念上一目了然，但是其主要的难度在于数据，因此在给出估计结果前，我们将先介绍这些数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专门估计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的文章还不多，不过许多文章在估计中国的生产率时对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参见Perkins, 1988; Chow 和 Li, 2002; 黄永峰等, 2003）。本文的资本存量估计与这些文献的区别主要有两点。首先，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我们在估计时使用了调整后的数据；其次，我们采用按现价计算的资本存量而不是不变价的资本存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计算的资本回报率，实际上是按现价计的资本产出比的函数。

首先我们要讨论估计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然后介绍数据，以及一些测算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将给出中国总资本回报率的估计值，开始对总资本回报率进行基础估计，然后计算考虑不同情况后的资本回报率，这些情况包括不同的部门范围，例如从计算中剔除城镇居民住宅、农业或采掘业；计量固定资本存量的不同方法，例如考虑存货价值，或假设固定资本的折旧率发生阶段性变化；计算从总资本收入中剔除税收收入后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估计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最后，本文考察了资本回报率在三次行业和各地区的差异，分析了中国资本配置的效率，以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我们的基础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在1979~1992年之间约为25%，在1993~1998年之间逐渐降到了20%，并自1998年之后保持在20%左右。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用同一方法测算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剔除城镇居民住宅部门和在资本存量中加入商业存货后，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近几年甚至有上升的趋势。总之，本文对包括所有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形式的总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并没有找到中国投资率过高的证据。而对资本回报率部门差异的初步分析还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一、方法

资本回报率有几种计算方法。一种是估计金融市场的资本回报率，然后从中推算出总资本回报率。对那些金融市场发达的经济，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显然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尚不适用这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用产出对资本进行回归。不过这种方法得到的资本回报率是有偏估计，因为回归中遗漏的变量通常会同时影响总产出和资本存量。

本文采纳的方法很简单，事实上，它的基础主要包括一个假设和一个核算等式。首先，我们考虑一个企业购买一单位边际资本用于生产。假设企业是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在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设），那么该交易的名义回报率是

$$(1) \quad i(t) = \frac{P_y(t)MPK_j(t)}{P_{K_j}(t)} - \delta_j + \hat{P}_{K_j}(t)$$

这里， i 是名义资本回报率， $P_{K_j}(t)$ 是 j 类资本品的价格， δ_j 是其折旧率， MPK_j 是其边际产品， $\hat{P}_{K_j}(t)$ 是 j 类资本品的价格变化率〔（1）式实际是Hall-Jorgenson资本租金公式的一个变化形式〕。这个公式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如果资本品市场运行有效，每种投资品和每个投资者的投资收益都应相等。很明显，资本品市场也可能会运行无效。其次，决定资本回报率的不是资本的边际产品，而是资本边际产品收入与资本价格之比。

通常我们无法观察到资本边际产品，因此不能用（1）式直接估计名义资本回报率。不过利用总产出中的资本份额可以反推出资本回报率，这里总产出的资本份额用1减劳动报酬份额来计算，即 $1 - \frac{W(t)L(t)}{P_Y(t)Y(t)}$ ，其中 W 是工资， L 是就业人数。另一方面，总产出中支付给资本的份额可以表示为

$$(2) \quad \alpha(t) \equiv \frac{\sum_j P_{K_j}(t)MPK_j(t)K_j(t)}{P_Y(t)Y(t)}$$

把（1）式代入上式，我们得到

$$(3) \quad \alpha(t) = \frac{P_K(t)K(t)[i(t) - \hat{P}_K(t) + \delta(t)]}{P_Y(t)Y(t)}$$

这里,

$$P_K(t)K(t) \equiv \sum_j P_{K_j}(t)K_j(t)$$

为总资本的名义价值,

$$\hat{P}_K(t) \equiv \sum_j \left(\frac{P_{K_j}(t)K_j(t)}{P_K(t)K(t)} \right) \hat{P}_{K_j}(t)$$

为资本价格的平均增长率,

$$\delta(t) \equiv \sum_j \left(\frac{P_{K_j}(t)K_j(t)}{P_K(t)K(t)} \right) \delta_j$$

则表示平均折旧率。它取决于资本的组成成分而随时间变化。利用(3)式,我们可以得到实际的资本回报率 $r(t)$,

$$(4) \quad r(t) = i(t) - \hat{P}_Y(t) = \frac{\alpha(t)}{P_K(t)K(t)/P_Y(t)Y(t)} + (\hat{P}_K(t) - \hat{P}_Y(t)) - \delta(t)$$

在后面,这个式子将被用来测算中国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后文简称为“资本回报率”)。

注意(4)式的关键是,它采用了按现价计的资本产出比,因而考虑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化,显然这个价格变化也是资本回报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卡塞利和詹姆斯·费雷尔也在测算各国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时提到了这一点(Caselli 和 Feyrer, 2006)。当资本品价格和产品价格相等时,两者的增长率也相同,(4)式退化为我们通常看到的资本回报率表达式,即资本占收入的份额与实际资本产出比的比值减去折旧率。

在(4)式中,我们假设企业是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当产品价格超出其边际成本时,资本收入包含利润(π),反映了不完全竞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品收入为 $\frac{P_Y}{\mu} MPK_j$,其中 $\mu \geq 1$ 为价格与边际成本之比(或1加上利润率)。此时,(2)式变为

$$(5) \quad \alpha(t) \equiv \frac{\sum_j \frac{P_Y(t)}{\mu} MPK_j(t)K_j(t)}{P_Y(t)Y(t)} + \frac{\pi(t)}{P_Y(t)Y(t)}$$

由于 $\frac{\mu-1}{\mu}$ 表示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此时实际资本回报率变为

$$(6) \quad r(t) = i(t) - \hat{P}_Y(t) = \frac{a(t) - \frac{\mu-1}{\mu}}{P_K(t)K(t)/P_Y(t)Y(t)} + (\hat{P}_K(t) - \hat{P}_Y(t)) - \delta(t)$$

上式表明，如果忽略不完全竞争，我们用（4）式测算的资本回报率会被高估。

这个误差到底会有多大呢？若假设资本的价格与产品的价格以相同速度增长，而劳动份额为0.5，折旧率为10%，按现价计的资本产出比为1.67^①，若企业作为产出品价格的接受者，其真实的资本回报率为20%。放松了价格接受者的假设后，并假设边际成本的利润加成成为10%，则真实的资本回报率将降为14%。在后面估计中国的真实资本回报率时，我们将不考虑利润加成这个问题。因为本文的目的是比较中国资本回报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以及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的结果。只有在不完全竞争带来的误差在中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或与其他经济相比程度有不同，用（4）式计算的资本回报率，才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二、数据

计算资本回报率，我们需要三类数据：总产出、总资本，以及资本收入的份额。我们将逐一介绍这三类数据的来源和选择。

1. 总产出

我们在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估计值时，与使用其他经济的数据相同，首先必须考虑其准确性。中国统计制度中两个具体制度与这个问题有重要的关系。

首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地方统计局向国家统计局的上报资料。由于担心地方政府有高估本地GDP的动机，许多学者对GDP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这确实曾是一个问题，但国家统计局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便通过建立独立渠道来获得数据，对地方上报的数据进行调整。同时，地方政府也不总有高报GDP的动机。例如，近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对

① 后面会看到，这些取值来自中国实际数据。

宏观经济进行降温，导致地方政府有低报GDP的动机，以规避中央实行紧缩型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国家统计局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经济普查，并据此调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①。普查完成后，国家统计局会对其报告的GDP进行追溯调整。显然，如果经济增长一直很快，那么，离最近的普查年份越远，未经调整的数据将越不准确，同时追溯调整对离普查越近的年份做出的调整也就越大。所幸的是，2004年经济普查刚刚过去，国家统计局已经基于这次经济普查对1978~2004年的GDP进行了调整。调整后，2004年GDP上调了16.8%，是固定资本形成调整幅度（上调了4.4%）的好几倍。我们的估计使用了调整后的数据，因此我们得到的投资率与以前的研究显然有差别。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对省际GDP进行了调整，使得各省GDP之和等于全国GDP。

安格斯·麦迪逊对中国官方报告GDP提过两点评价，一是1978年官方报告的GDP被低估了，二是GDP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过低（Maddison, 1998）。显然，1978年GDP估计值可能存在的问题，只会对该年的资本回报率有影响，并不会影响最近年份的估计值。GDP价格指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名义资本回报率，因为我们计算时采用了现价而非不变价的GDP，但确实会影响实际资本回报率。不过，注意到2004年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同时对GDP的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我们在估计时使用了调整后的价格指数。

可能还会有人担心企业报告的利润数据是否准确，特别是担心企业有高报利润的可能性。例如，跨国公司在中国享有比其本国更低的税率，他们很可能会故意通过内部定价策略来转移利润，高估其在中国取得的利润和增加值，以减少其在本国纳税额。不过，有几点理由可以说明这可能并不成其为问题：首先，在中国，企业向政府统计机构报告的数据不会用来作为征税的依据^②。其次，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所纳的税额在本国可以要求抵扣。第三，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只适合于跨国企业，中国企业不一定有高报利润的动机。事实上，蔡洪滨、刘俏和肖耿的研究表明国内企业为了避税倾向于低报利润（蔡洪滨等，2006）。

① 两次经济普查分别对GDP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1993年普查主要对第三产业进行调整，2004年经济普查对所有非农产业进行了调整。

② 在《中国经济普查条例》第33条中明确指出：在经济普查中收集到的对各经济单位和个人的资料的使用目的将严格限制在经济普查中，而不会作为对接受经济普查单位进行惩罚的依据。

2. 资本存量

我们要测算的第二个数据是资本存量。中国国家统计局（后面简称“统计局”）按月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政府用来度量总投资的官方指标。从图1中，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率从1981年的20%增加到2005年的略低于50%。许多人即凭此判断中国的投资过高，并指出现在投资率不断增加的这一趋势，在中国不可能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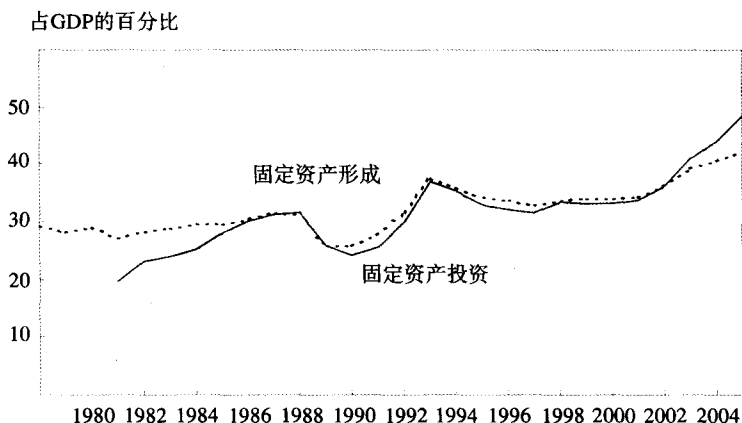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投资率，1978~2005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但是，有两点原因使得这一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不能用来准确测算中国资本存量的变化（许宪春，2000）。首先，这一指标包括购买土地和购买旧机器和房屋的支出。显然，这些支出都不能增加中国的可再生资本。其次，这一指标只统计了一定规模以上的投资项目，显然低估了总投资^①。

另一个较少被使用到的、可供选择的投资指标是“固定资本形成”，不过统计局按年而非按月公布该指标。统计局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减去土地使用权、旧机器设备和旧房屋的购置价值，然后再加上未纳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统计范围的项目价值，得到固定资本形成。在图1中，以固定资本形成占GDP份额计量的投资率，其增长速度明显要比固定资产投资率慢得多，仅从1978年的30%上涨到2005年的42%。由于固定资本形成能更准确地测量中国可再生资本的变化情况，我们将用这个指标来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

^① 确切地说，在1997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5万元以上的项目，从1997年开始，调查范围从5万元以上上调到50万元以上。